

双关语翻译下《霸王别姬》“游离性身份”流失

岳婷婷, 唐丽君

贵州财经大学外语学院, 贵州 贵阳

收稿日期: 2026年6月9日; 录用日期: 2026年7月31日; 发布日期: 2026年8月12日

摘要

本研究关注电影《霸王别姬》英译中的一个具体困境: 如何传递那些塑造程蝶衣“游离性身份”的双关表达。为此本文综合借鉴了德拉巴斯蒂塔的双关语翻译理论、赵会军的“常量 - 变量”操作模型以及祝朝伟的“杂糅”理论, 以此构建一个“技术操作 - 文化阐释”相结合的分析框架。研究显示, 由于语言与文化之间存在结构性差异, 译者在处理这些双关语时往往必须在“常量”与“变量”之间做出选择, 并采取各种补偿手段。然而这样的处理方式常常导致原文中精妙的多义结构被简化, 人物身份中那种微妙而矛盾的游离感也随之减弱。这一过程表明此类翻译并非简单的语言转换, 而实际上是对复杂文化主体进行跨文化阐释与重构的实践。

关键词

《霸王别姬》, 双关语翻译, 游离性身份, 常量 - 变量模型

The Loss of “Liminal Identity” in *Farewell My Concubine* under Pun Translation

Tingting Yue, Lijun Ta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Guizhou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Guiyang Guizhou

Received: June 9, 2026; accepted: July 31, 2026; published: August 12, 2026

Abstract

This study focuses on a specific dilemma in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film *Farewell My Concubine*: how to convey the punning expressions that shape Cheng Dieyi's “liminal identity”. To this end, the paper synthesizes Delabastita's theory of pun translation, Zhao Huijun's “constant-variable”

operational model, and Zhu Chaowei's "hybridity" theory, thereby constructing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that integrates "technical operation" with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due to structural differences betwee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translators often must choose between "constants" and "variables" while adopting various compensatory strategies. However, such treatments frequently result in the simplification of the original text's intricate polysemic structures, thereby diminishing the subtle and contradictory sense of liminality inherent in the character's identity. This process demonstrates that such translation is not a mere linguistic conversion but rather a practice of cross-cultural interpret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a complex cultural subject.

Keywords

Farewell My Concubine, Pun Translation, Liminal Identity, Constant-Variable Model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电影《霸王别姬》中程蝶衣“人戏不分、雌雄同在”的经典形象，高度依赖一系列精妙双关语的建构。“我本是女娇娥，又不是男儿郎”“从一而终”“不疯魔不成活”等台词，既是日常对话，又是戏曲念白与命运谶语，共同编织成一个充满“杂糅性”(hybridity)的符号网络，精准编码了程蝶衣游移于男/女、戏/真之间的“游离性身份”。这一身份正是一种无法被传统二元框架界定的复杂文化存在。

当电影进入英语世界，这些承载身份密码的双关语如何翻译，便成为根本性问题。翻译的成败不仅关乎语言形式的转换，更直接影响这一文化形象的独特性能否被异文化观众充分感知。自翻译研究发生“文化转向”以来，学界已将翻译视为涉及权力与身份协商的文化政治实践[1]。德拉巴斯蒂塔(1993)指出，双关语翻译最能模糊“翻译”与“改编”的界限，成为映照译者立场的镜子[2]。

围绕双关语翻译，西方研究以德拉巴斯蒂塔(1993)的类型学与“统计法则”为基石，系统解释了“P>CP”模式的结构制约。国内研究一方面引介应用这些理论[3]，另一方面探索本土化模型，如赵会军(2020)的“常量-变量”优化模型[4]。近年，祝朝伟(2024)从后现代视域出发，将双关语研究与“杂糅”等文化理论结合。聚焦《霸王别姬》，现有成果多从文化负载词、传播效果等宏观层面切入，但尚缺乏将特定双关语作为“游离性身份”建构密码，并系统运用上述理论进行微观分析与文化阐释的专门研究[5]。

鉴于此，本文从三个层面展开探索：理论整合层面，将德拉巴斯蒂塔的类型学、赵会军的微观模型与祝朝伟的文化身份理论有机融合，构建分析框架；实践分析层面，聚焦关键双关语在英译过程中的具体遭遇；文化阐释层面，揭示翻译行为如何参与并重塑这一复杂文化形象。围绕以上目标，拟探讨以下核心问题：这些关键双关语面临哪些由语言文化差异导致的结构性转换困境？译者采取了哪些具体策略进行意义协商与形式补偿？这些选择产生了怎样的文化传递效果，又存在哪些局限性？期望通过这些问题，为中国经典文艺作品的跨语际译介所遭遇的深层挑战，提供一个具体的分析视角与有益的参照。

为确保分析的严谨性，本文首先对所依据的英译字幕版本加以界定。研究采用的官方英译出自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出版，王向晖、余文青编著的《中国电影欣赏：霸王别姬》，该版本系配合对外汉语教学使用的电影教材，其字幕翻译兼顾语言学习与文化传播双重目标，在众多英译版本中具有一定代表性。需要指出的是，不同发行方、不同年代的DVD或流媒体版本可能存在字幕差异，本文的结论主要基于上

述特定译本展开。下文所称“官方英译”均指此版本。

2. 游离性身份密码的破译

程蝶衣的“游离性身份”高度依赖一系列精妙的双关语台词。为理解这些语言密码的跨语际转换,本节尝试将微观操作分析与宏观文化阐释相结合,构建一个分层分析框架。

在翻译研究中,双关语处理被视为检验译者能力的关键。德拉巴斯蒂塔(1993)系统分类了双关语翻译策略,并指出理论上最理想的“ $P > CP$ ”模式(用目标语同类双关语替换)因语言类型的固有差异而面临很大限制。这一“统计法则”解释了双关语“完美”翻译的结构性困境,国内学者如李明(2015)的研究也证实了该理论在汉外互译语境中的解释力[6]。为将宏观制约落实到微观分析,本文引入赵会军(2020)的“常量-变量”优化模型:将源语双关的三个意义点(双关义1、双关义2、语用含义)设为翻译中力求保存的“常量”,译文对应表达则为可优化的“变量”,翻译即是通过策略使“变量”趋近“常量”的努力。该模型为观察译者选择提供了精密工具。

然而,技术分析若止步于此,便难以触及翻译实践的文化核心。程蝶衣的身份本质上是无法被二元框架定义的“游离性他者”。祝朝伟(2024)指出,游移于性别、艺术与文化边界的人物形象,其文本天然带有抗拒单一解读的“杂糅性”。因此,翻译活动上升为一种文化伦理与身份的抉择:是维系这种“杂糅性”与独特性,还是对其加以驯化以适应目标文化的理解习惯?

本文所借用的三种理论资源——德拉巴斯蒂塔的双关语类型学、赵会军的“常量-变量”模型、祝朝伟的“杂糅性”理论——并非简单并置,而是在不同层面上形成互补与递进关系,共同作用于对同一分析对象的考察。

首先,从技术操作层面看,德拉巴斯蒂塔的“ $P > CP$ ”模式及其统计法则提供了对双关语翻译可能性的宏观预判,解释了为何“完美替换”在多数情况下难以实现。赵会军的“常量-变量”模型则在此基础上,将这种宏观制约转化为可操作的分析工具,通过将源语双关拆解为三个常量(双关义1、双关义2、语用含义),使译文的得失得以被精确量化与比较。这两个理论共同构成了对翻译行为“如何发生”的技术性描述。

其次,从文化阐释层面看,祝朝伟的“杂糅性”理论为技术分析的结果赋予了更深层的文化意义。赵会军模型中所测量的“常量损耗”,恰恰对应了文本“杂糅性”在翻译中的削弱。例如,当“娇娥/儿郎”被简化为“girl/boy”时,“常量-变量”模型记录了美学意涵的流失,而“杂糅性”理论则进一步揭示:这种流失意味着人物身份中由戏曲程式与社会性别之间的张力所构成的“游离空间”被压缩。因此,“常量-变量”模型实际上为“杂糅性”的损耗程度提供了一种可量化的观测指标。

再次,从伦理立场层面看,两种技术理论所揭示的“不可避免的损失”,迫使研究者追问一个更深层的问题:翻译应当在多大程度上保留源语的异质性,又应当在多大程度上迁就目标语的认知习惯?这一问题超出了技术范畴,进入了文化伦理的领域。三种理论由此形成了一个从“能否译”(德拉巴斯蒂塔)到“如何译”(赵会军)再到“应否如此译”(祝朝伟)的完整分析链条,使本文的讨论能够兼顾技术精确性与文化深度。

3. 译境中的流失

理论框架得以确立为我们深入解读文本提供了基础。借此,我们可以细致审视那些构建程蝶衣身份的核心双关语,在跨越语言障碍时所面临的具体困难以及译者为应对这些困难所采取的策略性调整。以下分析将从情感、性别、艺术追求与历史命运四个层面,系统地揭示这一语言密码转换过程中所遭遇的主要困境。

3.1. 情感符码

“不行！说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一辈子！”是程蝶衣对其情感伦理原则的彻底宣告。原文通过“年、月、天、时辰”的逐层递进与排比，累积起绝对、不容辩驳的语言气势。官方英译“Not enough! A lifetime is a lifetime! One day, even one second less...makes no lifetime!” [7] 面临着再现原作形式韵律与情感力量的双重挑战。

依据赵会军(2020)的“常量-变量”模型：源语中，常量 C1 是“一辈子”作为时间概念的极端量化强调；常量 C2 是其超越时间度量，成为“从一而终”、绝对忠诚的文化符号；常量 C3 是程蝶衣将戏剧角色关系移植于现实，对段小楼进行的情感索求，充满偏执与悲剧美感。译文中，变量 V1 以“A lifetime is a lifetime!”的重复实现了对时间概念的强调；变量 V2 放弃逐字翻译，用“makes no lifetime”抓住了“不完整即无效”的绝对化内核；变量 V3 以“Not enough!”的强烈否定起头，再现了人物的激烈情绪。

这一译例显示，面对汉语量词体系构筑的独特语言气势，实现理想的 P>CP 转换模式极为困难。译者的策略是意义重构与语用补偿：舍弃原文排比的表层形式，转而着力捕捉其“绝对性”与“情感律令”的核心意图。从文化身份建构的角度看，这种处理并未淡化程蝶衣的独特性，反而借助目标语的逻辑，强化了其情感世界封闭、超脱现实的特性，更加鲜明地衬托出他“游离”于寻常情感准则之外的独特身份。

3.2. 性别符码

“我本是女娇娥，又不是男儿郎”是程蝶衣性别身份形成过程中的关键节点，也是其复杂认同的起点。官方英译为“Yet I am by nature a girl, not a boy”。

依据赵会军(2020)的“常量-变量”模型，源语中常量 C1 (双关意义 1) 是戏曲《思凡》中旦角的标准自述性念白；常量 C2 (双关意义 2) 则承载着“娇娥”与“儿郎”这两个富含戏曲美学与传统性别文化意涵的意象所形成的诗意对峙；常量 C3 (语用含义) 是个体在暴力规训下被迫异化、接纳强加身份的创伤与悲剧。

在官方译文中，变量 V1 以“I am by nature a girl, not a boy”准确传递了表层性别指称；变量 V2 将“娇娥”与“儿郎”简化为中性的“girl”与“boy”，原词蕴含的戏曲特质与文化联想完全流失；变量 V3 则通过“by nature”一词的微妙反讽，部分触及了命运的强迫性与非自愿性。

这一译例印证了双关语翻译的典型困境：面对根植于特定文化审美与语言形式的语义双关，“P>CP”的“最优选择”几无可能。译者采用的是保留核心指称但牺牲美学形式的“意义关联延伸”。这一翻译策略实施了一次温和却深刻的驯化：程蝶衣身份中那种由戏曲程式所中介、在“扮演女性”与“社会性别”之间生成的充满张力的“游离性”，在翻译中被简化为一种更易为西方观众识别的“性别困惑”。

3.3. 艺术哲思

“你真是不疯魔不成活”是段小楼对程蝶衣生存状态的判词，凝练地概括了后者人戏不分、以艺为命的生命哲学。官方英译为“You're really obsessed”

依据赵会军(2020)的“常量-变量”模型，源语中常量 C1 (双关意义 1) 是梨园行内赞叹对技艺钻研到痴狂境地的俚语、行话；常量 C2 (双关意义 2) 指向一种“人戏不分”、将舞台伦理(如“从一而终”)全盘照进现实的存在方式与生命哲学；常量 C3 (语用含义) 则是言说者段小楼复杂的情感交织——包含敬畏、叹服、担忧、疏离乃至规劝。

在官方译文中，变量 V1 以“obsessed”基本对应了“痴迷”“沉迷”的核心语义；然而在变量 V2 和变量 V3 的传递上力有不逮。“疯魔”一词的精髓在于它混沌地融合了“宗教般的艺术献祭”(神圣性)与

“脱离常轨的精神状态”(病理化)这组矛盾,而“obsessed”在英语语境中更偏向单一维度的、常带负面色彩的偏执。译文“You're really obsessed”的情感色彩趋于单一,更接近于一个判断或描述,难以传递原语境中爱恨交织的复杂人际张力。

在此,一个源自东方艺术实践、充满辩证张力的境界描述,被转化为一个现代心理学框架下的个人心理标签。程蝶衣作为“艺术殉道者”这一独特形象的惊世骇俗之感,及其所代表的、挑战世俗生活逻辑的文化异质性,因此被部分地常规化。其身份的“游离性”(游走于神圣与疯癫、艺术与生活的边界)被削弱了。

3.4. 历史诗学与命运

“可是楚霸王都跪下来求饶了,那这京戏它能不亡吗?”与“我揭发姹紫嫣红,我揭发断壁残垣”构成了程蝶衣对艺术与个人命运在特定历史背景下的终极判词。官方英译分别为“*But now even the King of Chu is on his knees begging for mercy. Can Beijing opera survive? It's doomed.*”与“*The flowers and the decay, why I sang these for*”。

在“楚霸王”一句中。依据赵会军(2020)的“常量-变量”模型:常量 C1 是对段小楼在压力下屈服的写实描述;常量 C2 在于“楚霸王”意象的升华——它已凝练为京剧艺术乃至中国文化中英雄气节、宁折不弯的精神象征,“霸王跪地”象征着这种精神在巨大压力面前的彻底崩塌;常量 C3 是程蝶衣将个人幻灭感与对艺术命运的悲观判断等同,发出的混合绝望、反讽与先知式肯定的文化哀鸣。

官方译文中,变量 V1 准确传达了情节;变量 V2 保留“King of Chu”这一文化专有项,为象征意义保留了可能的基础,但其丰富内涵仍需依赖目标语观众的认知储备;变量 V3 通过“*Can it survive? It's doomed.*”的设问与重复,强化了宿命论的断言语气和绝望感,这是一种以情感强度补偿文化深度的语势强化策略。

在“姹紫嫣红”句中。常量 C1 是“姹紫嫣红”与“断壁残垣”这两个极具美学价值的中文成语;常量 C2 是它们所指代的京剧艺术极致之美及其所遭遇的悲剧性命运;常量 C3 是主人公在要求揭发“个人问题”的荒谬语境中,以精神崩溃的姿态揭发“美”本身与“美的毁灭”——用最典雅的语言承载最狰狞的内容。

官方译文将成语简化为“*The flowers and the decay*”,牺牲了凝练美感,隐喻性几乎流失;为补偿,译者增加“*why I sang these for*”,将诗性呓语转化为可逻辑理解的个人陈述。这几乎是保证理解的唯一路径,却是一次悲怆的审美降维。

两个案例的共性问题。 $P > CP$ 模式彻底失效。前者力量源于特定文化符号在特定语境中的炸裂性激活,后者源于诗意语言与特定历史语境的超验结合,二者都代表了“不可译性”的硬核,迫使翻译焦点从“形式再现”转向“意义阐释”与“情感传递”。

这种转向揭示了深刻的伦理困境与不可避免的折损。“楚霸王”句通过强化宿命论情感,凸显了程蝶衣作为“殉道者”的悲剧形象,尽管其与具体中国精神谱系的纠缠被部分普世化。“姹紫嫣红”句则付出了巨大的审美代价:雅致意象与狰狞现实碰撞所产生的炸裂诗意被严重稀释,程蝶衣“用至美审判至暗”的控诉锋芒被磨平。

这两个案例尖锐地指出了翻译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人物形象时的根本困境:为求“通达”,必先“驯化”。翻译成为一种有缺憾的跨文化中介——它让我们得以“知晓”这个人物的故事,却可能永远“错过”其原初讲述时的独特语调和灵魂重量。这正是跨文化理解的复杂本质:在获得理解可能性的同时,必须承受意义必然流失的代价。

4. 文化杂糅体的翻译困境

4.1. 翻译作为文化身份的“二次编码”与“重塑”

传统的翻译观常将译作视为对原作的“摹写”或“再现”，并且强调“忠实”与“对等”。从《霸王别姬》的案例来看，翻译更接近于对文化身份的“二次编码”与“重塑”过程。以程蝶衣的身份为例，其原始“编码”系统是高度依赖汉语音韵、戏曲程式、历史语境和双关修辞的复杂符号网络。当这套编码系统需要被移植到英语的符号体系中时，由于系统间的不兼容性(如赵会军模型中常量与变量的不对等，Delabastita 统计法则的制约)，必然发生信息的筛选、转喻和重构。

陆建平、朱倩雯(2023)在对影片两个译本的对比中发现，即使是面对同一文化元素(如“洞房花烛夜”)不同译者的“重塑”策略也大相径庭，或保留文化意象(bridal chamber)，或将其泛化(wedding)，这直接导致目标语观众构建的人物认知图景产生差异[8]。祝朝伟(2024)所指出的“游离性”人物，其身份的本质在于拒绝被单一、稳定的符号系统固定。翻译的“二次编码”过程，却在很大程度上被迫将其“锚定化”(如将“娇娥/儿郎”锚定为“girl/boy”)，或“逻辑化”(如为“姹紫嫣红”增添解释性链条)，从而部分消解了其身份的核心特质——“游离性”。因此翻译不仅是传递身份，更是在目标语境中依据译者的理解与目标文化的规范，对原身份进行一次主动的、创造性地“重塑”。

4.2. “异化”与“归化”策略的伦理困境及其超越

对《霸王别姬》双关语的翻译策略，可借助韦努蒂(Venuti, 1995)的“异化”与“归化”理论加以考察。面对“女娇娥”“疯魔”“姹紫嫣红”等文化异质性极强的符号，翻译面临两难：极端异化虽保留陌生感，却可能造成理解障碍；极端归化虽消除障碍，却会遮蔽源语文化的独特性，无异于文化同化[9]。

官方译本选择了协商性的“中间路径”：在保证基本情节易懂的前提下，有选择地保留部分文化意象(如“洞房”译为“bridal chamber”)，对更复杂者采取适度解释性归化(如“疯魔”译为“obsessed”，“姹紫嫣红”译为“flowers and the decay”)。这种策略引发双重质疑：从源语文化看，是否因过度追求“可接受性”而牺牲了文化符号的差异性？从译语文化看，这种被简化、便于消费的人物形象，是否反而阻碍了观众对源语文化复杂性的深入探究？

上述“中间路径”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电影字幕这一媒介的固有特性。与书面文学翻译不同，字幕翻译面临严格的时空限制：屏幕底部通常只能容纳一行至多两行文字，每条字幕的呈现时间仅数秒。这些物理限制使得加注、长串解释或保留完整双关结构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现实。因此，译者在“异化”与“归化”之间所做的选择，并非完全出于主观偏好，而往往是对媒介约束的被动回应。换言之，在字幕的有限时空内，许多理论上可行的“异化”策略实际上难以实施。

要超越这一困境，或许需要一种“分层补偿”的思路，而非单一的“阐释”方案。本文将在结论部分对此展开具体讨论。

4.3. 从《霸王别姬》看中国文学文化外译的深层挑战

《霸王别姬》的翻译案例投射出中国文学与文化外译所面临的深层挑战。中国文化的许多精髓恰恰体现在如双关语、典故、诗词意境、哲学范畴等高度依赖语言特性和历史传统的“可译性限度”区域。这些元素往往是构建中国文学人物独特身份与美学世界的关键密码。

当这些作品被译介时，面临的不仅是语言的转换，更是整个美学体系与认知方式的迁移。在中文观众看来，程蝶衣的悲剧是由其语言(戏词)与命运互文所铸就的诗意整体；而对英语观众而言，这一整体性可能因双关语的流失而被割裂，悲剧性更多依赖于情节推进和演员表演来传达。这就要求中国文学的外译实践，必须具备更强的“整体翻译诗学”意识。译者和出版策划者需要在项目初期，就对文本中此类

“文化硬核”的翻译策略进行顶层设计, 形成统一且具备理论自觉的处理原则。同时积极推动关于中国文学翻译理论的国际对话, 阐释诸如“意境”、“风骨”、“双关”等概念的翻译方法论, 为更深入、更尊重异质性的翻译实践提供理论支持。

5. 结论

通过对《霸王别姬》英文字幕中塑造程蝶衣“游离性身份”的双关语翻译进行剖析, 可以发现跨文化传播中一个根本性矛盾: 翻译让异质文化中的独特人物形象得以显现, 却也使其最独特的存在特质——语言的诗意、形式的趣味、意义的混合性——在转换中被不可避免地筛选和损耗。

受制于语言与文化的结构性差异, 理论上理想的“ $P > CP$ ”模式难以实现。实践中, 译者主要依据“常量-变量”框架对原文进行意义重构与语用补偿, 其实质是对文化身份的协商性“重塑”。这不仅不是技巧选择, 更触及文化伦理: 是竭力保留源语文化的异质光彩, 还是对其驯化以适应目标文化的认知模式? 《霸王别姬》的翻译实例显示, 在保证基本可懂度的前提下, 译本通常采取“异化”与“归化”之间的折中路径, 但这往往意味着在美学深度与哲学意蕴上做出妥协。

鉴于字幕媒介的固有约束, 本文建议将改进策略区分为不同层次, 分别面向大众传播场景与学术/深度文化交流场景。

面向大众传播(如院线公映、流媒体平台字幕): 可在字幕正文中采取更具创造性的选词策略, 以有限的改动暗示原文的复杂性: (1) 针对“疯魔”, 可尝试“*madly devoted*”或“*possessed by art*”等词组, 较之单一的“*obsessed*”更能传递“献身”与“痴狂”的双重面向; (2) 针对“姹紫嫣红/断壁残垣”, 在空间允许时可译为“*blooming splendor/crumbling ruins*”, 保留对仗结构与意象对比, 虽仍无法还原成语的凝练, 但比“*flowers and the decay*”更贴近原文的诗性逻辑。在学术或深度文化交流层面(如电影节学术放映、文化机构专题展映、课堂教学), 可建立“字幕+平行文本”的补充机制, 具体包括: 编撰独立的注释手册或导读手册, 逐条解释核心双关语的结构与文化渊源; 在数字平台上提供“流畅版”与“深度版”等多版本字幕选项; 以及在特别收录中附上译者的解说音轨, 讨论翻译选择及其文化考量。这种分层策略既能满足大众观影的流畅性需求, 又为有意深入了解的观众提供了通向文本复杂性的路径。

当然, 上述分析也存在局限。未来可拓展至多模态翻译分析、不同时期译本的比较研究, 以及通过实证方法考察读者的接受效果。面对“不可译”的永恒存在, 应持守一种“翻译的谦卑”: 既在语言极限处寻求意义的微光, 也坦然承认翻译的限度。真正的跨文化理解, 不能止于翻译提供的“版本”, 而应意识到, 在那些未被完全传达的“晦涩”深处, 正静默矗立着异质文化最本真的灵魂。翻译不仅是构建相识的桥梁, 更应诚实标出那些尚未或永难跨越的鸿沟——这份对差异的尊重, 才是跨文化对话走向深刻的伦理基石。

致 谢

本研究是在唐丽君教授的悉心指导下完成的。从论文的选题、框架设计到最终定稿, 唐丽君教授都给予了细致入微的指导和建设性的意见, 其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深厚的学术造诣使我受益良多。

感谢贵州财经大学外语学院各位同仁在研究过程中提供的支持与帮助。感谢参考文献中所有学者, 他们的研究成果为本论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最后, 感谢家人与朋友在论文写作期间给予的理解、鼓励与支持。

参考文献

- [1] Bassnett, S. and Lefevere, A. (1990) *Translation, History and Culture*. Pinter, 1-20, 123-133.

- [2] Delabastita, D. (1993) There's a Double Tongue: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Translation of Shakespeare's Wordplay,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Hamlet'. *Rodopi*, 1-60, 200-220. <https://doi.org/10.1163/9789004490581>
- [3] 张南峰. Delabastita 的双关语翻译理论在英汉翻译中的应用[J]. *中国翻译*, 2003, 24(1): 30-36.
- [4] 赵会军, 安岩. 双关语翻译中变量的意义优化策略[J]. *外语学刊*, 2020(6): 92-98.
- [5] 祝朝伟, 陈壮. 他者、杂糅与翻译: 后现代视域下英汉融合双关语翻译研究[J]. *上海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46(2): 89-98.
- [6] 李明. 双关语翻译最优选择的可行性研究——兼析《雷蒙德》两个汉译本的 P > CP 模式应用[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5, 35(3): 172-176.
- [7] 王向晖, 余文青. 中国电影欣赏: 霸王别姬[M]. 北京: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2009.
- [8] 陆建平, 朱倩雯. 国际传播视域下国产电影的文化元素英译策略研究——基于电影《霸王别姬》字幕两个英译本的对比分析[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23(6): 134-144.
- [9] Venuti, L. (1995)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 Routledge, 1-20, 120-150.